

# 中文版序

毛澤東是現代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卻缺少一部權威傳記。當然，關於這位中共領袖的傳記已有很多，但沒有一部是基於對原始文獻的全面考察，因為那些文獻即便保存在檔案館，大多也不對研究者開放。對於毛澤東，傳記作家往往不得不依靠道聽途說和謠傳、官方的宣傳和神話，以及相當程度的猜測。毛澤東的一生只有一個階段可以憑借豐富的原始資料詳實地加以描述，那就是他與約瑟夫·斯大林 (Joseph Stalin) 互有來往的1940年代，研究者可以用上從前保密而現已解密的蘇方資料。毛澤東仍然籠罩在許多謎團之中。

斯大林的情況剛好相反。對於共產主義現代中國的到來，斯大林是第二重要的角色，僅次於毛澤東。可查閱的有關斯大林的第一手原始文獻，數量多得驚人，使得研究者能夠深入探索他的生活以及統治，這比起我們對毛澤東的瞭解簡直天差地別。事實上，關於斯大林，最大的挑戰不是有些文獻仍然保密、無法查閱，儘管這一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存在；相反，挑戰在於文獻太多了。研究者必須閱讀並理解數百萬頁從前保密的材料，涉及斯大林的方方面面——從國內的高階政治到地緣政治，從經濟到文化與社會，而且是在全球的尺度上。斯大林已不再神秘。

不過，斯大林的傳記該怎樣構思和寫作呢？他是世界上最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但他的早年可以說微不足道。斯大林來自俄羅斯帝國偏遠的邊疆地區，出生於一個比較貧困的家庭，而且，除了年輕時在格魯

吉亞一個氣象台短暫地當過氣象員之外，多年來一直沒有工作。他很幸運，上了正教會辦的學校，但沒能上大學，也沒有讀完正教神學院，沒有成為神父，在成年時也沒有真正的職業。他在沙皇俄國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不斷受到政治警察的滋擾，被捕、坐牢和流放都是家常便飯。他多次從流放地逃脫，但又被送了回去。那時的斯大林幾乎沒有任何經濟來源，除了幾本書外身無長物。他錯過了前半生最重要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他被困在偏遠的東西伯利亞。要等到1917年秋天，在將近39歲的時候，他才過上穩定的生活，成為在俄國掌權的布爾什維克核心圈的一員。

這些情況意味着，任何斯大林的傳記都不應該專注於他那相當正常的童年和基本上無足輕重的青年時代的瑣碎細節——尤其是，所謂斯大林早年生活的細節，許多不過是傳說，而非事實。相反，有點悖論的是，斯大林的傳記一開始必須關注他所生長的更廣闊的世界，而在很久之後，在他掌權之後，又要關注他將要塑造的世界。不僅如此，正如讀者將會看到的，這部傳記甚至認為，在掌權之前斯大林的個性尚未完全定型，而斯大林的個性塑造了蘇聯的體制和世界的歷史背景。更確切地說，本書認為，掌權的經歷——建立和施行專政權力的數十年——形塑了斯大林並造就了日後世界所知的那個人。斯大林形塑了那種體制，那種體制也創造了斯大林。隨着時間的推移，斯大林其人與他所生長的世界越來越合而為一，這個過程起初很慢，但後來越來越強烈，直到最後，斯大林的傳記開始變得像世界歷史。

中國的讀者會進一步看到，本傳記的注意力集中於俄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因為在歐亞大陸的興衰變遷中它們的歷史軌跡有着深刻的關聯。歷經幾百年才聚合起來的沙皇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解體了。而列寧，以及更大程度上斯大林，設法用新的形式再度將其聚合，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俄的行動者，其中許多來自西伯利亞，曾幫助蒙古革命者將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來，將其變為蘇俄的第一個衛星國（或附庸國）。此外，在布爾什維克奪權之後的第一個十年，斯大林以及其他蘇俄幹部深深介入了中國國內的政治，本書對此作了一些新的分析。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爭奪在

整個歐亞大陸的影響力，既合作又競爭，時常針鋒相對。這種關係構成了延續至今的一段漫長歷史軌跡的一部分，斯大林在其中扮演了令人生畏的角色，並最終與毛澤東糾纏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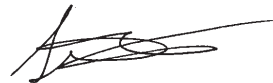
作者希望，《斯大林》第一卷能夠促進中國讀者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反思中俄關係，這一關係在近現代曾經歷種種影響深刻的事件，而將來也會見證許多程度更甚的曲折和轉變。

傑出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能夠承擔我這部作品中文版的出版工作，令我由衷感激。這樣一項工作的規模和挑戰是巨大的，但陳甜和胡召洋為了確保給中國讀者提供準確流暢的版本，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們的付出遠遠超出了職責所需。我非常感謝他們兩位以及出版社的其他同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是溝通中西方學術界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橋樑，能夠在這裏出版作品，對我來說是一份獨特的榮譽。

2022年4月

普林斯頓

斯蒂芬·考特金



## 前言及致謝

xi

三卷本《斯大林》所講的故事，是俄國在世界上的權力和斯大林在俄國（被重鑄為「蘇聯」）的權力。在某些方面，本書力圖描繪一部從斯大林的辦公室展開的世界歷史（至少在寫作時感覺如此）。之前我曾以某個工業小城總體歷史的形式，從街頭層面對斯大林時代進行過個案研究。<sup>\*</sup>若從辦公室視角檢視更為廣闊的社會——住所的小策略（the little tactics of the habitat），<sup>†</sup>必然沒有那麼精細，但政權也構成了一種社會。此外，我早先的那本書關注的是權力的來源，行使的方式及後果，這本書也是如此。故事是從斯大林的辦公室開始的，但並不是從他的觀點開始的。當我們觀察他試圖在整個歐亞大陸及以外的地方撬動權力槓桿時，需要記住，在他之前的其他人也執掌過俄國的舵輪。而蘇聯處在同帝俄一樣困難的地理條件之中，同帝俄一樣受到強鄰的打擊，儘管從地緣政治來說，蘇聯面臨的挑戰更大，因為一些曾經屬於沙皇的領土分離出去，成了敵對的獨立國家。同時，相比之前的沙皇國家，蘇維埃國家擁有更現代和更意識形態化的威權主義制度結構，它是斯大林領導的；而斯大林突出的一點是，他能把熱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大國的

---

<sup>\*</sup> 編註：指作者的專著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sup>†</sup> 譯註：這一說法來福柯，他認為空間的歷史也是權力的歷史，從地緣政治的大戰略到住所的小策略都是如此。參見福柯《權力的眼睛》（嚴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52頁。

感情，把反社會傾向和非凡的勤勉及決心，不可思議地結合起來。那位到1928年已不容小覷的人物，他是在甚麼時機、出於甚麼原因而崛起的？查明這些問題是本書的一大任務。另一任務則涉及如何看待單個的人，哪怕是斯大林，在歷史大潮中的作用。

xii 大戰略研究往往特別注重大規模的結構，有時會對偶然性或事件顧慮不周。與之相反，傳記研究則傾向於重視個體的意志，有時會對背後起作用的更大的力量失之考察。當然，傳記和歷史的結合可以相得益彰。本書的目的在於，詳細敘述大大小小的個人，是如何受限於他們的國家相對於別國的地位、國內制度的性質、觀念的強大影響、所處的歷史大勢（戰爭或和平，蕭條或繁榮）以及他者的作為或不作為，這些因素既成就了他們，也制約着他們。就連斯大林那樣的專政者，也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作出選擇。歷史充滿了意外；結果出乎意料和不如人意是常事。歷史格局的改觀，通常並非肇端於那些設法或短或長地掌控它們的人，而嶄露頭角的恰恰是能抓住機會的人。陸軍元帥赫爾穆特·馮·老毛奇伯爵（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 1800–1891）擔任普魯士和德國的總參謀長達31年，他把謀略貼切地稱為「權宜之計」或隨機應變，也就是因勢利導的能力。我們將會看到斯大林機詐多謀，一次次地利用了看似不利的形勢。但斯大林的統治也說明，在極其罕見的情況下，個人的決定如何給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結構帶來急劇的變化，並造成全球性的影響。

本書既帶有綜合的性質，也是在俄國的許多歷史檔案館和圖書館以及美國最重要的相關資料館中進行多年原創性研究的成果。在俄國進行的研究收穫頗豐，但有時也會是果戈理式的：有些檔案館對研究者完全「關閉」，但那裏的材料卻照樣在流傳；同一個研究者以前可以查閱，或者可以在研究人員共享的掃描文件中看到的材料，現在突然看不到了。對檔案館之外的檔案材料進行研究往往更有成效。本書還對檔案材料和公開出版的原始文件的縮微膠卷和掃描件作了詳盡的研究。反映斯大林時代的資料，數量增加得非常快，單靠個人的力量幾乎無法窮盡。最後，本書利用了大量的國際學術文獻。例如，要是沒有亞歷山大·奧斯特洛夫斯基（Aleksandr Ostrovskii）對青年斯大林所作的嚴謹研究，很

難想像本卷第一部的樣貌；沒有瓦連京·薩哈羅夫 (Valentin Sakharov) 對所謂弗拉基米爾·列寧 (Vladimir Lenin) 「遺囑」的傳統解釋的尖銳質疑，也難以設想第三部會是甚麼樣子。弗朗切斯科·本韋努蒂 (Francesco Benvenuti) 早在俄國內戰期間就很有預見性地證明了托洛茨基的政治缺陷，而對於這一發現，我在第八章作了進一步展開；最終解開1920年代初牽扯到斯大林和列寧的格魯吉亞事件這一繩結的是傑里米·史密斯 (Jeremy Smith)，讀者們將會發現，第十一章我將史密斯的研究與自己的一些發現結合起來。還有其他很多學者也應單獨列出；他們和上述幾位學者一樣，在尾註中得到了感謝。(我援引的學者大多是根據檔案或其他原始資料提出論證的，而在閱讀他們作品之前或者之後，我本人也常常查閱那些文獻。) 至於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公，對於探明他的性格和決策，他沒幫上甚麼忙。

《斯大林》這部書緣於我的著作經紀人安德魯·懷利 (Andrew Wylie)，他的眼光可以說是出了名的好。企鵝出版社的編輯斯科特·莫耶斯 (Scott Moyers) 以出色而老練的手法不厭其煩地檢查了整部文稿，也讓我對書籍的瞭解大為增進。我在英國的編輯西蒙·溫德爾 (Simon Winder) 提出了一些很有洞察力的問題並給出了很好的建議。同仁們慷慨地提供了深刻的批評，對於內容的完善幫助很大。只是人數太多，無法一一致謝。我的研究和寫作還得到了從普林斯頓大學到紐約公共圖書館等許多優秀機構的支持。我有幸從1989年開始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有大量的學術休假；紐約公共圖書館則是我幾十年來一直在發掘寶藏的地方，特別是我在圖書館中由瓊·斯特勞斯 (Jean Strouse) 負責的卡爾曼學者與作家中心待的那一年，收穫巨大。我還非常幸運地得到了一些基金會的資助，包括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會和約翰·西蒙·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最大的支持或許來自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在那裏，我起先是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訪問研究生，最後作為訪問教師參加了一年一度的保羅·格里戈里 (Paul Gregory) 蘇聯檔案工作坊，成為國家研究員，而現在則是聯屬研究員。胡佛研究所的檔案館無所不包，圖書館藏有不少珍本書籍——現在由埃里克·瓦金 (Eric Wakin) 管理得井井有條，對於研究20世紀的俄國/蘇聯來說，那裏依然是莫斯科以外的任何地方都無法企及的。